



真诚守信 夯实立身之本

孔子曾有一个有趣的比喻: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輗,小车无軏,其何以行之哉?”意思是说,人如果失去了信用或不讲信用,不知道他还能做什么。就像大车没有了輗,小车没有了軏,它靠什么行走呢?輗和軏是古代车子上连接车轴和车轱的关键部件,大车的叫“輗”,小车的叫“軏”,没有輗和軏,车子是不能行走的。这句话生动地诠释了信在我们安身立命中的作用。

宋代名臣司马光一生无论为官、治学还是处世,都持诚信之道。他说:“夫信者,人君之大宝也。”他曾自我评价:“平生所为,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。”司马光笃行诚信,源自良好的家教。宋人邵博在《邵氏闻见后录》中记载,司马光五岁时,家里有人送来一些青胡桃,他想吃却不知道如何剥皮,家里仆人用热水烫开了青皮。姐姐问他是谁想出的这个好办法,司马光逞能说是自己。恰巧目睹此事的父亲严厉地批评他说:“小孩子怎么敢撒谎骗人?”这给了司马光深刻的教训,“光自是不敢慢语”。

做官后,司马光在朝堂上也以诚信为宝,从不阳奉阴违、隐瞒观点或回避责任。担任并州通判时,司马光受庞籍派遣考察在麟州屈野河以西修筑城堡事宜,回来后上报认为有利于保护边界安全,不料后来去筑堡的官兵千余人大部被西夏军围歼。朝廷派御史前来查案,作为上司的庞籍独自承担了责任,这使司马光内心十分不安,接连上《论屈野河西修堡状》《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》,坦承事实,要求处分。朝廷并未追究,司马光又只身前往中书省和枢密院以求降罪,得到的答复是:“御史未给你定罪,何言降罪?”但这始终让司马光寝食不安,夜不能寐。

生活中的司马光同样诚实无欺,他家中有一匹好马,性情温顺、毛色鲜亮,晚年因为生活拮据,不得已想拉去集市卖掉以补贴家用。临去前,司马光叮嘱老仆说:“咱家这马平时还好,但到了夏天容易生肺病,一定要如实告诉买家。”老仆很是不解:“您说马有病,还怎么卖得出好价钱?”司马光正色道:“卖马事小,诚信事大,岂能因贪利而损名?”老仆只好遵照司马光说的话去做。在司马光居住的洛阳,如果有人做了不好的事,就会被别人批评说:“难道你就不怕司马光先生知道吗?”苏轼评价司马光:“诚心自然,天下信之。”清人陈宏谋也赞誉司马光一生“以至诚为主,以不欺为本”。

诚信的至高境界是不欺于人,也不欺于己,使自己内心安定,无愧于天地,这也是司马光所追求的道德境界。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,圣人是最高典范,一般人难以企及,但君子人格则是通过自身修养和主观努力可以达到的,而信则是君子人格所必备的素质和标准之一。《中庸》里说:“《诗》云:‘相在尔室,尚不愧于屋漏。’故君子不动而敬,不言而信。”意思是说,《诗经》里讲,一个人即使在屋里最隐蔽的地方,也应当无愧于神明。所以,君子没有行动之前,先存恭敬之心;没有说话之前,先存诚信之心。也就是说,君子的诚信品格是一以贯之的,是由内到外的诚实正直支撑的,而不是从华丽的言辞中获得。孔子还说:“言忠信,行笃敬,虽蛮貊之邦,行矣;言不忠信,行不笃敬,虽州里,行乎哉?”一个人如果忠诚老实、诚信不欺,就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尊敬,即使到了未开化的异族之地也能畅行无阻;反之,即使在本乡本土也难行得通。可见,信不仅是做人的基本品格,也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成就事业、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条件,是我们必须加以提高的道德修养。

言而有信 恪守交友之道

《论语·公冶长》里子路问孔子的志向,孔子回答说: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。”在他看来,朋友相互信任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。

东汉时,山阳郡金乡(今山东济宁)人范式与汝南郡(今河南汝南)人张劭同在太学读书,成为同窗好友。学成返乡时,二人依依惜别,范式对张劭说:“两年后,我到你家拜见你的父母,看看你的孩子。”于是约定好了日期。两年后,将要到约定的日期,张劭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,让她准备些酒菜招待好友范式。其母听了有些怀疑地说:“你们已经分别两年了,又相隔千里,你凭什么确信他一定能来呢?”张劭回答说:“巨卿信士,必不乖违。”范式是个讲信用的人,他一定不会违约的。张劭的母亲说:“如果真是这样,我就为你们酿酒。”到了约定的日子,范式果然到了,他拜见了张劭的父母,与张劭相聚饮酒,尽欢而别。

后来,范式入仕在家乡山阳郡担任功曹,二人很久没有见面。张劭因病不久于人世,他叹息说:“很遗憾不能见到我的生死之交。”身边人问他这个人是谁,张劭回答说:“山阳的范巨卿是我生死相交的朋友。”不久,张劭就

信以诚之 君子修德的必修课

范丽荣

孔子认为君子应具备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“耻其言而过其行”的品质,强调君子应有信,即言行一致,反对言行不一、言过其实。何谓“信”?《说文解字》中说:“信,诚也。”又说:“诚,信也。”从信的字面意义来看,“信者,人言也”,其基本内涵应是诚实不欺、守言重诺。信作为儒家“五常”之一,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,是一个人为人处世、安身立命的基础,因而也成为君子道德修养不可或缺的内容。



去世了。这一天,范式突然梦到张劭穿着黑色祭服,帽子上的带子也没有系,对他说:“你我已阴阳两隔,我将在某天下葬,你如果没有忘记我,能否再见面一面?”范式猛地惊醒过来,悲伤得泪流不止。他脱去官服,快马加鞭,一路赶往汝南。张劭的棺木正要下葬时,一辆白马拉的素车奔驰而来,张劭的母亲说:“这一定是范巨卿到了。”范式在墓前叩拜行礼,说:“元伯,你上路吧,我们走在生死两条路上,就此永别了。”然后拉着棺木上的绳子走在前面,在场的人全都流下了眼泪。

安葬好张劭,范式留下来为好友修整坟墓,周围种上松柏,一切收拾妥当后方才离去。范式与张劭生死相交的故事在金乡称为“鸡黍之约”,范式家乡山阳范庄也因此更名为鸡黍村且沿用至今。

范式不负千里之约,与张劭成为朋友相交的典范,原因就在于言而有信。在传统社会中,朋友关系是五种人伦关系(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)中的一种,朋友相交,必须遵从诚信的道德要求,这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和前提。孔子在与弟子的谈话中,经常谈到信的问题,提出要“主忠信”“言忠信”“谨而信”“与朋友交,言而有信”等,同时,他对狂妄自傲、弄虚作假、不讲信用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,说:“狂而不直,侗而不愿,恇而不信,吾不知之矣。”意思是说,狂妄自大又不率直,愚昧无知又不诚实,表面诚恳却不守信用,我不知道有的人为什么会这样。在他看来,正直忠恳、诚实守信,是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的基本原则,如果缺少了诚信的保障,人与人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交往是不可想象的。正因如此,儒家子弟对修养诚信美德都高度重视,曾参说:“吾日三省吾身,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”把与人交往中是否做到忠实诚信作为每天多次反省自省的内容之一,正是在这种严格的要求下,诚信之德的修养才会成为一种自觉,从而日渐深厚。

赏罚有信 厚植为政之基

信不仅是立身之本、交友之道,也是以德治国的重要方法。孔子说:“宽则得众,信则民任焉。”身居上位的人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百姓,讲求信用,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和信任,这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问题。

唐武德三年(620),割据一方的军阀刘武周兵败后,他的部将尉迟敬德和寻相一起投降了秦王李世民。尉迟敬德以勇武著称,深得李世民喜爱。然而时间不长,寻相叛逃了,李世民的嫡系将领怀疑尉迟敬德也不可靠,便将他囚禁了起来,并请求李世民杀掉他。李世民断然拒绝,当即下令将尉迟敬德释放,并把他召到自己的大帐里,赏给他金银,真诚地对他说:“大丈夫意气相投互相信赖,希望你不要介怀受到的猜忌。如果你想叛离我,今天就把这点金银作为你的路费,以表达我们这段时间共事的情

谊。”尉迟敬德大为感动,称永不会背叛。

有一天,尉迟敬德跟随李世民在榆泉打猎,恰巧遇到王世充率数万大军前来决战。王世充的骁将单雄信见李世民兵马不多,率领骑兵直奔而来,尉迟敬德一见大呼一声,跃马而出,一枪便将单雄信从马上挑下来,吓得敌军慌忙后退,尉迟敬德则保护李世民冲出重围。随后,他又率骑兵与王世充交战,大败敌军。胜利归来,李世民抚摸着尉迟敬德的后背说:“大家都认为你会叛离的时候,我却对你坚信不疑,但也没想到善恶相报来得这么快!”于是赏赐给尉迟敬德金银一篋,从此更加信任他了。

贞观六年(632),李世民大宴群臣,尉迟敬德自恃功高,对座位安排不满,甚至对任城王李道宗大打出手,好端端的宴会不欢而散。事后,李世民对尉迟敬德进行了一番极具威慑力的训诫:“我曾读《汉书》,看到汉高祖刘邦诛杀韩信、彭越等功臣,内心一直责怪刘邦残忍。我登基后,本想保全你们这些功臣,让你们子孙绵延。但如今恃功骄纵,让我明白韩信等人的死并非刘邦的过错,而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朝堂自有规矩,赏罚必须分明。你再大的功劳,我也不能每次都袒护你,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!”尉迟敬德跪倒请罪,从此收敛起狂妄之心。最终,尉迟敬德得善终,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。

唐太宗作为历史上的明君,对于臣下不会人云亦云、动辄怀疑,而是以信任赢得忠诚;也不会一功遮百丑、听任之,而是赏罚分明,从而营造了君臣相互信任的良好氛围。在儒家思想中,信对于国家治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子贡曾经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,孔子说:“备足粮食,充足军备,获得人民的信任。”子贡问:“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,三项中去掉哪一项?”孔子说:“去掉军备。”子贡又问:“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,剩下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?”孔子说:“去掉食物。自古以来谁都会死,但如果如果没有百姓的信任,就不能够立足了。”在孔子看来,信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,军备、粮食虽然都是治理好国家的基石,但民众的信任更为关键。正因如此,孔子才把信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:“子以四教:文、行、忠、信。”为政者要想得到百姓的信任,必须做到以身作则,守信践诺,做出表率,如孔子所说:“上好礼,则民莫敢不敬;上好义,则民莫敢不服;上好信,则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,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。”为政者只有重视礼、义、信,诚恳守诺,讲求信誉,四方百姓才会与之同心同德,忠诚无二。

敬事而信 修养忠义之德

孟子说:“大人者,言不必信,行不必果,惟义所在。”也就是说,真正的君子,说过的话不一定要守信,做事不一定要有结果,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义理。孟子这一观点看似与孔子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的思想相悖,实则是为信明

确了道义内核,是对孔子诚信思想的继承与发展。真正的守信不能僵化固守形式上的约定,而应以道义为根本,这才是信的至高境界。

卫灵公时,太子蒯聩因不满灵公夫人南子干预政治,派人刺杀她,结果没有成功,只好逃亡国外。灵公死后,蒯聩的儿子公子辄被立为国君,是为卫出公。但蒯聩一直心有不甘,想夺回王位,便伙同自己的姐姐劫持卫国执政大臣孔悝发动政变。此时孔子的弟子子路正在孔悝的封地做邑宰,听说卫国发生了内乱,他立刻从外地赶往国都。在半路上,子路遇到了自己的师弟子羔,他刚从城里逃出来。子羔对子路说:“出公已经跑了,卫国已经乱了,城门已经关了,快回去吧,你这时候去城里只会惹祸上身。”子路回答说:“食其食者不避其难。”我既然领受了俸禄,就不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选择逃避。

子羔劝说无效只得独自离开,子路奋力前行,来到城门外,城门果然已经关闭。等了一段时间,恰巧有使者入城,子路便跟随使者的队伍混了进去。蒯聩与孔悝正在一处高台上,子路大声劝阻,蒯聩不听,子路于是想纵火烧掉高台。蒯聩害怕了,急忙派出武士攻击子路,子路受伤倒地,系帽子的绳子都断了,帽子掉到了地上。子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,于是放下武器,把帽子捡起来重新戴上并系好绳子,说:“君子死而冠不免。”君子即使死去,也不会使自己的衣冠凌乱,随后从容就死。当初孔子听说卫国发生了内乱,就十分不安地说:“嗟乎,由死矣!”子路果真死在了那里。

卫国发生政变,大多数人都和子羔一样选择了逃离,而子路却成为一个勇敢的逆行者,原因就在于他认为“食人之禄,忠人之事”是为君子的大义,虽死而不能回避。在儒家看来,信是重要的职业操守,提倡“敬事而信”,即在工作中要做到恭敬勤恳、忠于职守,具有敬业精神;也提倡“执事敬”“事思敬”“谨而信”,要求对待工作要尽职尽责、严肃谨慎、忠诚老实,而不能玩忽职守、敷衍塞责、弄虚作假,否则,就不是信;还提倡“为人谋而不忠乎”,要自觉反思是否做到了尽心竭力对待他人的托付。当然,儒家也反对不讲条件、不顾情境的机械式守信,甚至称之为“硃然小人哉”,对此,孔子提出的主张是:“君子义以为质,礼以行之,孙以出之,信以成之。”意思是说,君子以道义作为行为的根本原则,把礼仪作为规范,以谦逊的姿态践行,通过诚信来保证实现。

儒家所倡导的诚信,从来不是拘泥小节、固守形式的小信,而是以道义为灵魂、以坚守为底色的大信。信以义为本,义以信为行,信义相融,方为君子之信。子路舍身赴义、结缨而死,正是将诚信与忠义合而为一,以生命践行“敬事而信”的操守。由此可见,真正的诚信,始于立身,达于交友,用于为政,归于道义。它以真诚为根,以道义为尺,以内省为功,以坚守为要。唯有心怀敬畏、言行笃实、守义不惑、持信不移,方能抵达不欺人、不欺心、不愧于天地的至信之境,这也正是儒家“信以诚之”的精神真谛。

千年科场里的文心与尘烟

卜庆萍



科场规矩森严,防弊与舞弊的较量,亦是千年不散的尘烟。为护文运公平,官府定下严苛规制,入场搜身,细查衣物,连干粮都要掰开查验,唯恐一丝夹带扰乱秩序。可总有投机者费尽心思,藏经于内衣夹层,匿小抄于笔砚中空,更有甚者暗通关节,妄图走捷径取功名。明代一考生将小抄藏于拐杖,本以为天衣无缝,却在入场时被兵卒拦下,伎俩败露,引得满堂哗然;更有人慌乱之中错带家书、药方,本想舞弊反成荒唐笑柄,窘迫之态令人慨叹。只是舞弊之路从无边途,一旦事发,轻则永绝仕路,重则流放归罪。铁面考官坐镇考场,守的是公平,更是文脉的清白。

最见人烟烟火的,是科场里清苦却鲜活的日常。古时乡试、会试,多是长日磨战,九天六夜封闭在狭小号舍之中,方寸之地便是士子的天地。盛夏酷暑,闷热难耐,蚊虫绕灯飞舞;寒冬腊月,冷风穿堂,笔墨几欲凝冻。考生们自带干粮被褥,自行安顿食宿,有人啃着冷硬麦饼,仍摇头晃脑构思文章,饼渣落于卷上亦浑然不觉;有人夜读答题,不慎引燃灯纸,引得全场骚动;更有人疲惫不堪

伏案小憩,醒来时天光已亮,慌忙提笔疾书,手忙脚乱间,尽是真实的士子情态。相邻号舍的考生,虽咫尺相隔却默默相守,各自潜心卷册,以笔墨自勉,在压抑的氛围里,守着一份文人的清雅与从容,让清苦的科场,多了几分温情与文韵。

科场之中,亦藏着文脉传承的无声力量。那些朝夕苦读的典籍,不仅是应试的凭借,更是刻入骨血的文化基因。士子们在笔墨间研习孔孟之道、唐宋华章,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,融入一字一句的答卷之中。即便屡试不第,所学所知也未曾荒废,或开馆授徒教化乡邻,或著书立说传之后世,让经典文脉在民间生生不息。科场如熔炉,淬炼的不仅是功名之心,更是文人的学识与风骨,让儒家文脉历经千年而不绝,在一代代士子的坚守中绵延赓续,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根脉。

阅卷放榜之际,悲欢离合更添万般情致。古代阅卷,不唯文采,亦藏考官心境与偏好,有人偏爱质朴文风,便将平实之作拔为上等;有人倾心工整字迹,便对清秀笔墨青眼有加,随性取舍间,生出不少意外机缘。而放榜之

日,更是全城盛事,闹市街头金榜高悬,人山人海争相围观。有人一眼见名,喜极而泣,多年寒窗终得回响;有人遍寻不见,黯然离场,一腔热忱化作落寞。《儒林外史》中范进中举的癫狂,虽是文学描摹,却道尽了古人对功名的执念。亦有豁达文人,落第而不落魄,转身寄情山水,以诗文抒怀,将失意化作传世笔墨,反倒成就了另一种人生风流。

千年科场,亦衍生出脉脉雅俗。考前亲友赠糕送粽,取“高中”之意,藏着最质朴的祝福;登科之后,新科进士游街赴宴,京城万人空巷,共贺文运昌盛;文人之间贺诗题字、诗文唱和,将登科之喜,化作满城风雅。

岁月流转,贡院的钟声早已消散在历史风烟里,可那些科场旧事依旧鲜活。白发童生的执着、少年士子的意气、清苦度日的坚守、悲欢放榜的情致,都化作文脉里的细碎星光。它不仅是古人择优选才的制度,更是中国文人精神的缩影,藏着执着、风雅与烟火气。如今,择优取士的初心依旧,而那段贡院春秋里的文心尘烟,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中温润而厚重的永恒记忆。